

四条哲学道路, 批判韦伯, 80年度与90年代, 中国学术总体判断

, December 6, 2025 23:41

西方哲学的研究者, 在这个潮流下, 也许有理由比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同仁多一丝清醒。因为当代西方的社会科学话语都有其哲学上的来源, 也蕴含了哲学上的问题和困境。更麻烦的是, 它把哲学的整全视野切割了, 把哲学的世界关怀抛弃了。我个人对这些从现象学运动或者尼采、福柯、德里达那里衍生出来的玩意儿总是提不起兴趣。因为哲学有它特有的彻底性。这个彻底性为哲学自己带来法度。所谓学有本末源流、事有轻重缓急。哲学是大本大源之学。学习哲学的方式, 不可效法其他人文社会科学, 被末流所误。这是我一贯的态度。在整个90年代, 我下意识地固守着一种决绝的立场。决意以我自己的方式克服80年代的缺陷, 同时绝不抹杀80年代那几乎是伟大的一面。这就是说, 要像80年代一样, 始终思考最大的、最后的问题——学哲学的人不思考这些问题, 谁来思考呢? ——, 但要立足于前人的思考, 要多方综合权衡, 不可为一时需要牺牲思想资源的丰富性, 要切实、要慎重、要宏阔。

我是以埋头系统研读原典的方式推进80年代遗产的。80年代的整个思想运动有它自己的原典依据, 就是从早期马克思到康德。康德可以有四个推进方向, 一是取道新康德主义到马克斯·韦伯, 从韦伯往下, 可以接社会学、法学与经济学, 这就是90年代以来整个社会科学运动的秘密。但康德还可以有其他的推进方向, 第二、三条是西方哲学史的推进方向。这两条路, 一条是正路、一条是歧出。正路是通过胡塞尔现象学到海德格尔, 再通过海德格尔及其后学返回西方文明的希腊源头。另一条是通过维特根斯坦再到语言分析哲学。我的西哲学史学习主要追从前一条道路, 我现在教了好几年希腊哲学, 终于前进到古代了。后一条我只学到维特根斯坦, 因为那即使喧闹一时, 终非西学的正宗。推进康德还有最后一条秘密道路, 对于中国思想至关重要, 即通过牟宗三的康德解释返回宋明理学, 最终获得一个激活中国思想伟大传统的哲学视野。这条道路可以与康德的西方哲学推进结合在一起, 为解决中西体用问题提供真正的哲学门径。这就是我个人的用力方向。我也相信, 这是90年代以来, 身陷以学术为名的社会科学沼泽之中的中国思想摆脱困境的真正出路。

对学术思想之争的, 我个人的结论就是一句话, 要超越韦伯式的“康德”道路。

韦伯以新康德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立学说为学术与政治分野的基本出发点——这可以追溯到康德所谓现象与物自身之间的界限。他以为学术或者科学自身是应当价值无涉的。但社会科学研究的又是有价值观的行动者，而行动者的各自的价值系统背后则是所谓诸神。社会科学研究者要理解有价值的行动者之行动意义，所以不得不理解这些诸神。但它自身又只是认知者，并非行动者，因而必须只在理解的前提下研究价值与行动的因果关系，而于价值系统之间的诸神之争，无所裁断。但政治必定是依据价值做出的决断，则学术人一定要警惕成为灌输政治理念的、讲台上的先知。另一方面，韦伯又对现代政治做了马基雅维利式的理解。他本人在学术研究之外，也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对崛起的德意志的命运充满忧患。但他以为政治是魔鬼的事业，因此多从政治现实主义的霸术出发做冷静的实际政治分析。这样的政治观同现代民族国家完全匹配。这就是说，国家是必要之邪恶。现代民族国家得将自己建立在共同意见这样低下的基础上，学术与知识对这样的基础不能也不可有丝毫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近代德国的命运，就是成功至于鼎盛的学术与操切鲁莽乃至失败的政治。这个命运本身就是对韦伯政治观的最好判决。割裂学术与政治的本质联系，只能导致把政治留给或没有高远理想或没有审慎智慧的政客，把学术留给缺乏常识、现实感与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韦伯政治观的背后实质是基督教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简单对峙。这既不是西方古典思想的想法，更与中国传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政治观格格不入。在中国古代传统那里，政治不可没有心物身家学问的基础。修己之学也不可没有政治的关怀。中国圣人的学问，虽云规模宏大，亦可一言以蔽之曰：修己以安百姓。即以克明峻德、允执其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止于至善为旨归。这样的学术，不是什么价值无涉的因果解释之学。这样的政治体系，也不是以政治现实主义霸术为逻辑的现代民族国家。

我之所以要专门谈论学术政治之关系，是由于80年代是一个思想与政治旨趣同样旺盛的时代，而90年代以来，以专业的名义拒绝整全宏大的思想探索、以学术的名义拒绝严肃审慎的政治思考已成了社会科学的纪律。在这样的纪律之下，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很可能就是一个在学术上只有课题，而无问题的人，一个在政治上只有个人情绪，而无历史头脑的人。大学精英拒绝引导政治，或者出于日益逼仄的专业局限也引导不了政治，政治就只好交给银行富豪与街头愤青。这样的社会科学讲台，当然无法重温德国学术的成就，却足以复蹈德国政治的失败。要之，我对学术和政治关系的看法也是简单的一句话：要超越韦伯式的马基雅维利道路。

80年代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思考大问题的时代。其长处在于问题意识明确，视野开阔，较少受到学科的内在限制，因此80年代的知识界，学术话题、公共知识界话题和思想话题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可以有许多超出本专业的宏大关怀。但80年代学风的短处同样十分清楚：方式粗疏、结论轻率、急于引进西学新潮，对西方学术脉络的历史性和中国问题谱系的复杂性的认知都不足。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问题上，80年代思想界的主流回答是简单清楚的，现代化是好的、可取的。中国传统是应当检讨的。应当接续被革命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传统的现代化应当体现为实质上的西方化，即使在形式上无法做到。这些回应都凝聚在80年代的思想导师李泽厚两个著名概念里：这就是新启蒙、西体中用。

90年代的思想视野并没有对80年代的实质超越，而只是把80年代准备好的精神遗产转化为自我封闭、自我生产的学术话题，并以自己的方式推进和分割了它。例如笼统的现代化论题，在90年代就落实为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与宪政国家的讨论，从而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与法学所肢解。由于社会科学的规范化能力远远高于人文学术。80年代的人文思想一面在90年代开始式微，除了在公共知识界或者文艺青年的圈子里一度掀起诸如人文精神讨论、后现代主义思潮之类的涟漪外，人文方面可谓波澜不惊，一片沉闷。这直接影响到高校人文学术的研究方式。史学首当其冲地加快了社会科学化的步伐，90年代中晚期，海外汉学的中译本开始大量涌入。这些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论式研究中国问题的作品在中国人文学界越来越获得了典范的意义。这基本是以北京为中心，以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中国学术》这本学刊为中心向全国散播的（插话：我也碰巧为这本刊物做过几年的执行编辑，当时整个编辑部，除了我一人，都是北京高校的青年教师。这足以说明海外汉学的传播中心在北京。复旦赶上这个浪潮有个10好几年的滞后性，好像现在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落潮的时候，才把它当一个战略要点发展）。海外汉学以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带动了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我们至今能在史学界年轻一代的作品里看到“空间”、“身体”、“权力”、“话语”，“治理的技术”、“地方性知识”、“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早期现代性”等等等等这些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话语。文论界的重要作品亦复如是。

关于未来20年和30年的中国学术的总体判断，可以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留学运动的影响达到顶峰，中国学术界全部换血。这是学术和教育上的休克疗法，也就是中国学术史的又一次大断裂。归根结底，这就是没有真正的“中国学术”，而只是“学术在中国”，也就是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区分部及其总代理之类。

中国思想自身的问题意识彻底丧失，或者只有象征性的存在，中国思想成为没有学术肉身的幽魂；而学院里的学术，应对的是西方学刊弄的那些主流“前沿”话题，和中国思想没有多大的关系，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是中国思想自身的问题意识不绝如缕，且能转化成各层次的学术议题，重建中国学术的学术主权和自主性，学术共通性可以再生产。这个局面，我称之为学术上的再建国。这非常可欲，但现在看上去，实现的可能性，或无曲折地实现的可能性会小一些。

可能性之第三种，就是第一种可能成为学界主流，第二种可能是学界的边缘。虽然是学界边缘，仍然在学界，且不止一种模式。比如说贺雪峰老师带团队的模式，还有北京、上海一些学人保持的一些模式。我们可能不会断，这已经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了，即使不会断，也是边缘的。

最后提一点儿期望，期望中国学术未来能做到：首先，现实问题化；其次，问题学术化；第三，学术自我批判与整合化。所谓现实问题化，就是说最大的问题意识来源于现实。所谓问题学术化，就是要为问题的提出和回应找到学术方法。为问题找到方法，而非仅仅大而化之地阐释与空想，这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这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最应该去做的事情。没有这一层，所谓的中国话语只能沦为媒体中另外一个方向的口号，虽然有时也需要，但行之不远，只能是权宜之计。学术要有一个自我的批判，即学术一方面要不断自我检讨、综合，同时要以学术的方式检讨学术。怎么自我批判呢？在运用中必然要经历各种调整，这就是一种批判。以范式检讨的方式自我审视学术，这也是一种批判。把各种不同的，甚至看上去相反的传统和资源——西方的、中国的、传统的、现代的——进行批判性的综合，这可以说是学术上的“通三统”。国际化也有个好处，现在中国的学院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地方，基本上所有学派和传统正集结在一个小小的院系里，未来一定会“打架”。欧美的院系往往一派独大，人数又少，单薄了些。古今中西之争、科学玄学之争、科学人文之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大争论，就会在同一个学科甚至二级学科中发生。“打架”时间长了，过一两代有大人物出来，一定会有综合。我们不要放弃根据地去打游击战。我们的正事是在学院里面做事情，守先待后。如果最后能出这样的人物，把所有的资源调动起来，对中国和世界这几个世纪的变化、曲折有一个完整性的回应，这是学术中国性摆脱危机走上真正复兴的一个最好的结局，也是我作为中国学人的最后希望。